

【文学艺术】

忧患意识与立言传世

焦泰平, 孙希娟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古代优秀作家通过忧国忧民忧己表达出来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在“立德立功”之途不顺畅时, 以“立言传世”的表达方式, 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不朽。

关键词: 古代作家; 忧患意识; 立言; 传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2-0073-03

Consciousness of worrying and creation of words to be handed down

JIAO Tai-ping, SUN Xi-ju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ncient writers expresse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worrying through their descriptions of worrying about their countries and people. They had the strong sens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ir striving for improving merits and morals failed they tended to create words to be handed down so as to realize the eternity of their value in pursuit and spirits.

Key words: ancient writers; worrying; create words; hand down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许多忧世伤时之作, 表现了作家深重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拟在概述忧患意识表达方式的基础上, 进而探讨形成忧患意识的文化渊源和古代作家借此表达出的价值追求。

一、忧患意识的表达方式

古代作家的忧患意识主要是从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 从《诗经》发端, 直至“五四”前古典文学的终结, 忧患的情绪及其抒发, 贯穿始末。大而概之, 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忧患意识, 可归纳为忧国、忧民、忧己三种情况。

(一) 忧国

即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文学史第一首为王室命运衰微感伤的作品, 要算《诗经·王风·黍离》一诗。周幽王时, 申侯勾结犬戎杀幽王于骊山, 周土被占; 而后犬戎又攻入洛阳, 逐走襄王, 于是产生了周大夫来到镐京后感时伤旧的黍离之痛: “彼黍

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迟迟, 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重章叠句、往复回环的咏叹, 表达了诗人古朴苍凉而又激越悲愤的情感, 同时又唤起世人匡救社稷的社会责任感。屈原的作品, 大多弥漫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在屈原生前, 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 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迫在眉睫的气氛, 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岌岌可危的实际形势, 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清醒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贾谊生活在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 朝廷上下均认为国泰民安, 独贾谊时发忧世之言。他在《治安策》中对文帝说: “臣窃惟事势, 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 可为太息者六。” 贾谊的赋虽没有铺陈时事, 但其中充溢着悲愤抑郁之情, 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一致的。当贾谊南谪渡湘水时, 作赋吊屈原道: “鸾凤伏窜兮, 鸱鸺翱翔。” 又说: “国

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真是声泪俱下。屈原正是自吊。因为由于贤才遭忌和忠言不纳以致使国家人民受到损害,正是屈贾二人共同的悲剧,也是两人共有的深哀巨痛。汉末大乱以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对社会触目惊心的破坏,唤起了文人们一种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恢复了士人群体原有的弘道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当时著名诗人曹操、曹植、王粲、陈琳、阮籍、嵇康等,在政治上都欲有一番作为。他们诗中,既有建功立业的壮志,如曹植《薤露行》:“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但更多的则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忧患之声。忧心国事,是魏晋时期诗歌的主调。

唐代最有忧患感的诗人当推杜甫和白居易。被后人称为“史诗”的杜诗,不但在描写当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时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而且在预见当时尚未发生而即将发生的历史进程时,也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而这种预见又和诗人的忧患感同在。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经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此时,他的作品已经带有浓重的抑郁忧愁的基调。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谒先主庙》写道:“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北征》诗:“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这些安史之乱中的诗句,深深地表达了杜甫的忧国情怀。中唐的白居易,继承杜甫的传统,其创作《新乐府》、《秦中吟》等组诗,每一章前仿效《诗》小序作一短序,明确指出诗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除直斥政治弊端、“补察时政”外,忧患之情同样显而易见。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文人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进步的文人普遍关心国家政事,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等人的散文体现出关切现实、长于政论的显著特点,诗歌亦以忧心国事为主要内容。在宋室南渡之后,深沉的忧患意识,造成了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文坛出现了“爱国词派”,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刘克庄等,将家国之思、救世之志融入词作,或忧山河破碎,或忧统治集团的投降误国。正如清人所指出的,南渡后诸诗人“抚感时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1]

(二)忧民

忧国必忧民。传统儒家历来主张“邦以民为本”,所以古典文学作品中忧国常与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周

期性动乱之中。改朝换代,战乱不已;新王朝建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都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正如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加之赋税繁重,天灾频繁,百姓常处在饥寒交迫的境遇之中。这种社会现实自然引起悲天悯人的文人的同情与关注。例如《孟子》一书就提出行王道、施仁政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省刑罚,薄赋敛”,希望统治者减轻剥削。在《梁惠王上》中,提出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能够使人民得以温饱,免于虐政。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描写官吏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人民起而反抗,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唐代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更形象地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现实。

由此可见,自先秦以来,“忧民”已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意识。它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思想,文学史上为民生而忧患的作品不胜枚举。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都是发之肺腑的忧民之叹。

(三)忧己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忧患个人身世、发愤抒郁的作品随处可见。这种人生的忧患意识,主要出于个人社会使命感不能实现的苦闷,它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怀才不遇和忧生之嗟。

怀才不遇是封建时代文人们的普遍遭遇。封建专制,天子独尊,知识分子只有为朝廷所用,才能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和自我价值。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所以当正直的文人怀抱济世之心步入社会时,大都痛苦地发现仕途多舛,举步维艰,如李白所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盛世如此,即使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时,有志之士也多被排斥,如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仕途除极少数者顺利外,绝大多数遭遇坎坷。他们或暂时得志,不久便失意,如屈原、白居易、柳宗元、苏轼、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均未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敬梓、曹雪芹等。这样,悲士不遇、壮志难伸便成为古代作家久写不衰的传统主题。对此,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有一段很形象的概括:“《离骚》为屈大夫之哭

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所谓“哭泣”,即借此寄托或抒发的人生忧患和悲愤。

忧生之嗟主要表达的是人生短暂与时间无限的矛盾。人生短暂,岁月无情,这是一对矛盾。它很容易唤起有志之士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屈原在《离骚》中第一次明确写出了时间的生命价值:“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对时间的深入体悟中,生命意识与时间忧患结伴而产生出来,开始了时间观念的自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显然,这种以时间忧患与生命意识为内容的时间描写,是基于对人生进取的追求,既注重现世的功业,更重视身后的名声。像曹操来自追求周公之志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李白岁月不居、功业未就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陆游《错刀行》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等等,均是充满岁月流逝的无奈焦灼感和功名未就的忧患感。

怀才不遇和忧生之嗟在古代文人作品中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抒发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更感觉到了岁月流逝的无情,而时不我待、来日不多更加重了才不被用的悲伤。这种个体生命的忧患,往往表达出的却是对社会政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读来尤为感人。

二、忧患意识的文化渊源和价值追求

考察忧患意识的形成,可追溯到古代中国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生存的自然条件。3000年以前,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洪水旱灾不断,生存环境恶劣,人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想不到的灾难随时都会降临,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很早就感到生活的严峻。先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现实在他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因此,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是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的。当社会摆脱野蛮步入文明,当人们具有了对环境和自身的反思能力时,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成了代代相续的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百家争鸣,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流派,都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感情倾向。《庄子·骈拇》中说:“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的确说出儒家学派的特点。儒家经典中,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沉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诗经》中更充满了忧危之词,《大雅·常武》:“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邶风·载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孔子则首次指出了忧患感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孟子甚至提出了“生于忧患”的著名命题^[3]。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忧的精神,正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积极因素之一,对后世文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其忧患意识的重要的文化渊源。它鼓励文人寸阴是惜,积极进取,争取在有限的一生中成名成功。《左传》中将其归纳为“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之说,告诫人们,凭这“三不朽”的途径,可使人的精神超越肉体,获得永存。

所谓“立德”,是指追求个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古代一般知识分子都以“君子”来自我要求和期望,表现为道德上的高度自觉。所谓“立功”,是指建功立业,它又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主张把个体的立功和群体的哀乐荣衰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只要为国家一君主建立功业,便实现了人格的不朽。所谓立言,正如《左传》正义所说:“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存立于世,乃是立言也。”所立之言虽不全是文学,但包括文学无疑。曹丕据此在《典论·论文》中进一步宣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三不朽”之说,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甚大。而大多数文人在“立德”、“立功”道路上奔走得并不顺畅,最终都走上了“立言”之途。立德、立功也好,立言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工具。司马迁早年何曾没有“立功”之志,但因替李陵说情而得罪了汉武帝,蒙耻而受宫刑,于是走上了立言之途。他在《史记·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是对先秦“三不朽”说的深化和补

(下转第79页)

困境与危机中找出社会与道德上的原因。健康的精神状态必须建立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基础之上。《儿子与情人》所着力描写的精神问题同样包含着社会因素。

《儿子与情人》的完成标志着劳伦斯从他魂牵梦绕、束缚精神的个人问题中解脱了出来。母亲的阴影已经消失,他的才华终于能自由发挥了。于是,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深入探讨社会和精神问题,其结果便是孕育和诞生了《虹》和《恋爱中的妇女》这两本最重要的小说,使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三、结 语

总之,佛洛伊德理论的产生对于20世纪英国文

坛无疑是异常强烈地震,只是在余震过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它的震动之猛和影响之深。受其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大亨·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和佛吉尼亚·沃尔夫等。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是劳伦斯创作的两根支柱,而其心理学内容则是劳伦斯创作之所以成为英国现代主义小说高峰时期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佛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达到了罕见程度。

参考文献:

- [1] Elisabeth B, Booz,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4.
- [2] D·H·Lawrence. *Sons and lovers*[M]. 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75页)

充。他与其他立言者总是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抒发内心的忧患和积愤,才成为立言者的,也只有这样的立言者,才会具有不朽的人生价值。

“立德、立功、立言”总体强调的是立志求善。立志求善的生命超脱不是把人的生命作为一次性完成来看待的,而是从人类的整体来考察一己的存在。在永恒的时光前,每一个生命个体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个体生命建立的功业却能名垂青史,获得精神上的不朽。这种立志求善的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规范与整合下,已经形成为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与内驱力,使他们无不受其熏染、鼓舞,从而在人生如梦的生命悲叹中振作起来,积极投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正因如此,从自沉汨罗的屈原、痛哭流涕的贾谊到穷困奔走

的杜甫,在后人心目中并非以失败者的形象而存在,他们的作品所蕴涵的以国家社稷为重,以民生民瘼为怀的忧患感,正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古代优秀作家通过其作品表现出的忧患意识,直面社会与人生,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折射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虽然他们大多数人仕途不通,功名未就,但通过“立言”之途,最终实现了超功利的精神上的不朽!

参考文献:

- [1] 纪 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 [3]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责任编辑 杨彬智]